

LA CHINE DE MAO

K.S. KAROL

L'AUTRE COMMUNISME



[法] K. S. 卡罗尔

毛泽东的中国

毛泽东的中国

[法]K.S.卡罗尔 著
刘立仁 贺季生 译

(内部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ACHEVÉ D'IMPRIMER LE 27 JANVIER 1967
PAR L'IMPRIMERIE HÉRISSEY A ÉVREUX
POUR ROBERT LAFFONT ÉDITEUR A PARIS

N°D'ÉDITEUR : 2529
N°D'IMPRIMEUR : 3741
DÉPOT LÉGAL : 1^{er} TRIMESTRE 1967

责任编辑 顾庆荣

毛泽东的中国

〔法〕K.S.卡罗尔 著
刘立仁 贺季生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131875印张 330千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

ISBN 7-221-00911-2/D·11 定价：4.90元

(内部发行)

出版者的话

本书原名《毛的中国——另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是一部外国记者写中国的作品，出版后在国外影响很大。本书作者K.S.卡罗尔系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好友，六十年代中期他访问了我国，到过十八个省、市、自治区。在本书中，作者较客观地记录了自己在中国大地上的所见所闻，描述了中国“文化大革命”前夜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风风雨雨，同时也表露了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困惑不解和对中国前途的担心。

本书中所提到的史实不一定都准确，书中作者对若干问题的分析和评论也不一尽确当，希望读者认真分析和鉴别。把本书介绍给广大中国读者，包括亲身经历过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和此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让大家都认真地听一听当时世界上存在的“另一种声音”，由此而引起对历史的反思，想来是有益的。

目 录

第一章	“红卫兵”风起云涌之际	(1)
一、	我为什么访华	(1)
二、	阿尔及尔的午宴	(6)
三、	四月五万里	(10)
四、	斯大林与毛泽东	(16)
五、	表面与实际	(23)
六、	“红卫兵”的出现	(26)
七、	延安精神	(33)
第二章	中国人今日看往事	(39)
一、	预言和实践	(39)
二、	十二人、六人及方法问题	(45)
三、	国际何用	(50)
四、	毛泽东故里	(62)
五、	卓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与 “左倾冒险主义者”	(71)
六、	“荒谬绝伦”的路线	(76)
七、	“实权派”	(84)
八、	从狐狸洞到千疮百孔的合作	(92)
九、	延安的法伦斯泰尔	(97)
十、	一位女战士的自述	(105)
十一、	中国的皮埃蒙特人	(109)
十二、	解放军的运输大队长	(114)
十三、	上海哨兵	(120)

十四、国旗和南京中山陵	(124)
十五、未雨绸缪	(130)
第三章 农村的意识形态	(139)
一、农民的包围	(139)
二、通向共产主义的捷径	(145)
三、公社今貌	(150)
四、忆苦报告	(160)
五、爱情与政治	(167)
六、魔鬼	(176)
七、思想与收成	(183)
第四章 城里人“正确的政治思想”	(191)
一、一个中国	(191)
二、街头巷尾	(196)
三、拥挤，但没有污垢	(200)
四、灵活的计划	(206)
五、从羊肉片的薄厚谈起	(212)
六、中国工人的“五好”活动	(226)
七、学习雷锋	(236)
第五章 探索中的无产阶级文化	(243)
一、文化领域的“不断革命”	(243)
二、蒙古的云雀沉默了	(251)
三、“马克思主义者”、“黑格尔主义者” 和“爱国主义者”	(265)
四、百花相似何其多	(277)
五、第四代：怎样才能减少第五代的人口	(285)
六、“崎岖的科学道路”	(290)
七、当《人民日报》发表文学作品与托尔斯泰和 巴尔扎克的作品相媲美的时候	(296)

八、军队的海洋.....	(306)
第六章 中国与世界.....	(316)
一、一个“否定一切”的社会.....	(316)
二、伪君子的十字军远征.....	(326)
三、北京同莫斯科的争吵.....	(340)
四、第二颗原子弹.....	(357)
五、异端的起源.....	(374)
六、中央帝国的边界.....	(385)
七、尼赫鲁、阿尤布·汗和艾地.....	(394)
八、共产主义的“悲哀”.....	(407)
译 后 记.....	(419)

第一章

“红卫兵”风起云涌之际

一、我为什么访华

战前，当我还在波兰罗兹读中学时，就听到这样一种说法：中国人只要每个人拿起一根木棍，就能组成一支战无不胜的大军。说这话的是我们当时的一位地理老师，名叫塔代·格雷贝尔。此人并非种族主义分子，他说这番话的用意，不是贩卖“黄祸”论借以吓唬我们，恰恰相反，他常常为和平、勤劳、贫穷的中国人民遭受日本军国主义（我们的敌人柏林—罗马轴心的同盟军）的蹂躏而痛心疾首。

塔代·格雷贝尔为什么会流落到波兰外省城市这所校风异常正统的中学里来，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他先前在法国住过好长时间，通晓好几种语言，对上地理课毫无兴趣。他从回忆往事中得到慰藉，并且喜欢向我们讲述世界大事。从他的讲述中，我们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热情，这在当时惯于循规蹈矩而不敢越雷池半步的波兰，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他的言论要是放在别人身上，很可能招惹麻烦，然而同事们都认为他是个性情怪

僻的人，不跟他计较。学生们也是一样，毫不客气地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格雷贝尔大叔”，只要他上课，他们就为所欲为，乱做一团。可是，这位“格雷贝尔大叔”打分时从不为难任何人，对于专心致志听讲的学生则予以奖励。我就是那些专心听讲学生中的一个。他的讲述使我获益匪浅。是他，唤起了我了解广阔世界的欲望；是他，使我感觉到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与我息息相关；是他，使我知道远在天涯海角的中国人和欧洲反法西斯主义者遥相呼应，进行着一场同样性质的战斗。通过他的介绍，我内心模模糊糊觉得，自己是和灾难深重、渴望和平生活的中国站在一起的。格雷贝尔希望中国人民拿起的棍棒只是用来驱逐外来侵略者的，此外别无他用。

少年时代的记忆是难以磨灭的。访华期间，每当我看见孩子们拿着木枪玩，就想起塔代·格雷贝尔，想起他关于中国不可战胜的热情洋溢的话语。有时候，我甚至在内心进行种种假设：要是中国人能像我的老师期望的那样，从30年代初就武装起来，那会发生什么情况？会不会把法西斯主义早日粉粹？会不会因此而避免二次大战的爆发？一句话，我有点想入非非了。我的陪同不喜欢自己的“被保护人”迷失路径，甚至也不喜欢他们思想开小差。所以，当他们看见我的神态时，竟忧虑起来。其实他们误会了。回首往事，我能更好地理解，即便全中国都实现了军事化，在我看来对别人也不会构成威胁。

如果说，拉黄包车的苦力已经令人欣慰地消失了，那么，我学生时代有关中国的种种想象在这次访华时还是亲眼见到了：贫苦农民弯腰弓背、赤手空拳劳作于稻田之中的景象；男人们排着长队，累得气喘吁吁拉犁前行的景象；被强迫裹足的女人蹒跚而行的景象。今天的中国是解放了，但昔日的中国并没有完全消失。工业列强对之实行侵略和剥削留下的种种痕迹依然随处可见，可是这个国家确确实实在一日千里地前进着。

没见过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集中劳动、仅凭着每人的一双手修建水坝或公路的场面，你是无法明白人类的伟力的。看见中国人在几乎没有工具的条件下正在修建或已经建成的一个个巨大工程，真不知道该为他们令人惊异的毅力而喝彩叫好呢，还是该为这个不愿向他们供给器具的不公世道喟然长叹？因为，中国现今为之奋斗的，正是为了战胜贫穷和落后，恰如我的老师期望他们能够赢得战争那样，凭的是自己的双手、自己的棍棒、自己众多的人民。

不错，我是带着早先的好感而访华的。然而，我了解大部分西方工业强国，他们的财富横流与中国的清贫如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不禁要惊讶的发问：一个欧洲人，更不用说北美人了，即便不很富裕，可依然过得舒服，他为什么要反华？为什么要借口“黄祸”为自己的仇华行径辩解？西方人是否仅仅害怕这些昔日被殖民制度奴役的人们会在明天夺走他们的财富？是不是他们内疚抱愧的心理使他们担心，中国人有朝一日会要求对自己祖辈蒙受的欺侮和不公赔罪道歉？或者他们仅仅为内心深处不可告人的反共情绪所左右而晕头转向丧失理智？中国历史上也许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面对众多的敌人，而他自己依然是当今世界现存秩序的受害者。相反，那些饭饱酒足的国家依然从这种秩序中大捞好处。

我在此并不想让大家为中国人民的苦难伤心落泪。中国经济上的落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正在通过巨大的努力，进行前无古人的试验，以期迎头赶上；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这种试验必然会对世界其它各地发生影响。我的上述论断，听上去也许有点口号味道，但这是事实：再有几十年，这个有着六亿五千万人口，几乎处于中世纪时代的农业国，将会变成一个工业化的现代国家。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中国会经历痛苦；明天的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将由两方面的因素去塑造，一方面是他们

经历的痛苦，另一方面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传统。因此，必须忘却偏见，努力理解这项伟大解放事业的意义。

但是，理解并不意味着“完全赞同”或“毫无保留的支持”。我早就知道会在中国耳闻目睹一些令人灰心气馁或忧虑不安的事，因为这不是我第一次深入一个“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了。我甚至可以说，自己就是一名社会主义建设的老战士。十六岁时，我为战争所迫而中途辍学，离开了罗兹，离开了波兰，置身于苏维埃的世界里。没过多久，有人告诉我，以后就永远如此了。

我没有因此而恼怒，也很少为波兰于1939年被人从地图上抹去、处于军人铁蹄之下而痛哭流涕。我那时还年轻，不够加入共产党的年龄，但我打心眼跟共产党站在一边。说实话，我心里甚至很高兴能到苏联，以至对这个新的祖国对我和所有从德寇占领下逃难而来的波兰人所给予的接待毫无怨言。接待得很冷，天气冷，表情冷——前往莫斯科，必须经过天寒地冻的西伯利亚。有了这段经历，更增加了我到达莫斯科时的喜悦心情。站在红场上，面对金色大字写的苏维埃人誓与“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阶级兄弟”站在一起的标语，我如释重负，喜不自禁，竟哭泣起来。可是，就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墨迹未干之时，苏联就在布格河的桥上，把一批德共党员拱手交给了纳粹刽子手。

五年以后，战争已近尾声，我又一次来到红场，会见波兰爱国者联盟的领导人。这些人就是未来的华沙共产主义政府的掌权人物，当时正在莫斯科饭店开会。我们商谈将来重返波兰的问题，商谈如何在波兰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不言而喻的），同时避免曾经流行于苏联的灾难和恐怖的问题。这些“越轨”的言论，我们是在红场上边散步边谈的，为的是不要被人偷听或被窃听器窃录。列宁陵墓对面甘姆商店的墙上写的标语，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反正，我是再也不相信什么标语口号了。

1946年我重返波兰，依然不断思索着苏联的各种令人惶惑不安的问题，不然，我就无法全心全意地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当时波兰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苏联的援助下进行的。我想苏联早晚会把自己的一套做法照搬过来。民族沙文主义已经使波兰蒙受了巨大的灾难，如果再试图煽动波兰的民族主义情绪以抵消苏联的影响，我认为十分危险的主张。回到日盼夜想的故国反而更不自在，看来我是命中注定要流落他乡做个无国籍者了。

我终于在法国定居下来，当时我仍然坚信社会主义。我并不象别的难民那样，梦想着报个人私仇；我也不希望波兰国内的政权垮台。和许多西方知识分子一样，我仍然希望社会主义能够逐渐恢复理性和国际主义的本来面目，重新打开探索真理的道路，再也不能将其当成信条。旅苏七年的所见所闻向我表明，物质匮乏、教条主义、精神文化上的封闭，即便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无助于造就能够实现人道主义伟大理想的英才。也许，在一个受到外部威胁的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初期，这是难以避免的痛苦？也许，一旦渡过了物质最困难的阶段，东方国家会和世界普遍的传统重新携手而致力于建设一个真正的集体主义社会？

非斯大林化开始，我们有理由期待苏联集团从此走上这条道路。往日的“宗教”受到严厉的批判，谁也不认为高级领导人手里掌握着绝对真理、是根本批评不得的，人们可以进行无拘无束、充分说理的讨论了。当然，在共产党国家和共产主义政党内部长期形成的习惯妨碍着运动的顺利发展，一些具有宗教思想的人物拼命维护被人摒弃的旧信条，非斯大林化在这个已经忘记真正的民主为何物的集团里引起了新的矛盾。自由的到来是个缓慢的过程，但运动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在欧洲，我们觉得，无论如何，东方集团在发生变化。

就在这一时刻，中国共产党人出来强烈反对苏联的新政策。说句实话，对这一举动人们早就有所准备。

苏联所宣布的国际主义，被斯大林厚颜无耻地利用了，人们再也不买帐了。对无条件忠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世界革命的领袖苏联的主张，大家多有怨言。每个国家、每个共产党，虽然嘴里不公开说，可实际上都在追求行动自由，都在最大限度地捍卫自身的利益。南斯拉夫人，紧接着还有波兰人和匈牙利人，都先于中国把对莫斯科的暗中反对变成了公开的冲突。这里，只有中国“举足轻重”，有希望取代苏联而充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首领。

中国一登上国际舞台，便在世界政治中充当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已经不能对之视而不见了，必须去了解它。其中的原因，倒不是出于同情，也不是出于对它那秀丽景色的迷恋；而是因为共产主义集团的演变，它同西方的各种关系都取决于中国。

“我过去长期相信只有苏联是天堂，以至于现在无法相信还有另一个天堂，它更加遥远，更加难以捉摸。”这是先担任《人道报》社论撰稿人、后担任该报驻莫斯科记者的彼埃尔·古尔达德临终前不久对我说的一番话。他从二十岁起参加斗争，认为入了党就必须把一切献给党。我敬重他，和他颇有交情；但另一方面，看到他必须为党的所有决定，甚至那些使他忧心如焚或心灰意冷的决定进行维护和辩解时，我又怜悯起他了。

在我看来，中国也不是天堂，我只是想了解中国式的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并事先不带任何框框地到现场去，根据真凭实据进行估价。隔岸观火，我总觉得没有什么把握评判中国人的国际政策，更不用说评判其国内政策了。前面说过，我是同情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但我并不是无条件的追随者，更何况，我没有任何特殊资格取得中国的入境签证——这是件颇为难办的事。

二、阿尔及尔的午宴

我获得签证完全是机缘。1963年圣诞节那天，几乎纯属偶然，

我被邀请参加一个官方宴会。吃饭过程中，我把要写作本书的写法当面讲给周恩来总理——他成了第一个了解我的写作意图的中国人。我万万没有料到，他对我的计划极感兴趣，并且答应助我一臂之力。六个月以后，中国驻巴黎使馆通知我，正在研究我的入境申请，又过了六个月，我取得了签证。

说起事情的起因，那就更早了。早在1962年《酒瓶》社的摄影记者马克·里布就建议和我一起访华。马克·里布熟悉亚洲，1957年曾在印度住过一年，又在中国度过了四个月。此后，他很想再度访华。这种访问，最好两人结伴而行，而他是最理想的旅伴。我答应下来，又找到出版商，请他们给予财政上的资助。

就我个人而言，访华要成功还有一个困难要克服。尽管从1950年起我就住在巴黎，但我尚未取得法国国籍。出门在外，我带的是灰色的“波兰难民”证，海关官员和警察一看，惊讶中带着戒备。每次旅行，我都要申请签证，说明申请的理由，特别要花费口舌说服各国领事，告诉他我会返回法国，不会在他们的国家长久居留。一般说来，这不过是浪费点时间，只要我工作的报社、杂志社写个介绍信，问题也就解决了。但对中国人来说，介绍信能解决问题吗？我一直持怀疑态度。

当然，做为《新政治家》杂志的记者，我可以跑到伦敦找中国领事（因为当时巴黎没有设中国领事馆），那就必须跟他这样说：“我是英国《新政治家》杂志记者，常驻法国，身份是波兰难民，以前当过七年苏联公民。”这种说法让人觉得极不庄重。关于共产主义世界我写过无数篇文章，但这似乎都无补于改善我这“四不像”的处境。再说，那时的中国人正声嘶力竭地为斯大林的俄国辩护，对一个在“美好的年代”离开俄国、对俄国不肯事事歌功颂德的人，他们当然会倍加戒备，更何况正如人们所说，斯大林分子宁肯要右翼人士，也不肯要那些以社会主义原则的名义对他们进行批评的人。

我料定必然遭到拒绝，就决定去找我的好友、曾写过许多有关中国著作的埃德加·斯诺，请他帮忙想想办法。在马克·里布的陪同下，我赶到瑞士的圣塞尔格，在斯诺家里找到了他。

埃德加·斯诺是个不肯随波逐流的美国人。他既不是共产主义者，甚至也不是共产主义的“同路人”。在中国处于水深火热的岁月里，他曾在中国呆过，试图搞清楚“赤匪”究竟是什么人？他们内心的想法究竟是什么？仅此而已。1936年，他来到中国西北荒僻的“匪区”，找到了这帮“赤匪”，询问了他们为什么而战，毛泽东亲自回答他的提问，甚至向他讲述了自己的生平，共产党的其它领导人也纷纷仿效。他满载而归，带回了一部真正的红色中国名人录。他对中国的了解远胜其他人，只要打开任何一部有关中国的严肃著作，即可发现其中就有斯诺的贡献；现代的中国问题专家和政治分析家都大量从斯诺的著作中汲取营养。

斯诺告诉我，在我的签证问题上，他帮不了大忙，求他帮忙的新闻记者太多了。再说，即便他愿意帮忙，果真能帮到点子上么？他是不愿意让我扫兴的，但还是告诉我，他认为我成功的希望很小。然而，正是因为我认识斯诺才促成了我的中国之行。事情还得从阿尔及尔的午宴说起。

1963年12月，周恩来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首次访问非洲各国，在阿尔及尔，因为新闻界只允许在第二道栏杆后面远远眺望，所以新闻记者自然形成了一道保护中国代表团的屏障。我进行了无数次努力，试图接近周恩来，但均未奏效。正当我准备返回巴黎之际，接到了一张请柬，这使我惊讶不已。请柬邀我参加当时阿尔及利亚共和国外交部长布特弗里卡先生和国民指导部长谢里夫·贝尔卡森先生于12月25日在大学城为周恩来举行的欢迎宴会。很幸运，宴会桌上，我被安排坐在一位翻译的旁边，几乎和中国总理面对面。

对于东道主，周恩来早已熟悉，别后重逢，他显得格外高

兴。六十九岁的人了^①，他头上没有一根白发，看上去相当年轻。他深知自己的魅力，谈笑风生，应付裕如，堪称美国人所说的“宴会的灵魂”。宴会行将结束之际，我趁着片刻的沉默插了一句话，故意带上埃德加·斯诺的名字，想试探一下周恩来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果然向我打听斯诺——我们共同的朋友——的近况，乌黑发亮的眼睛紧紧盯着我。过了一会儿，他又扭过头去，问了布特弗里卡一句什么，我没有听清楚，但布特弗里卡回答时声音却相当高：“他不是阿尔及利亚人，但他是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朋友。”看到周恩来似乎还想了解更多的情况，布特弗里卡又补了一句：“这位新闻记者是一切革命的朋友。”

是时候了。于是我把自己“大杂烩”式的经历和身世讲给他听，告诉他，我想访华，想写一本书。

听到这里，周恩来微微一笑，其中虽然没有敌意，但看来他感到为难：希望访华的记者他见的多了。不过，他还是递给我一张纸，要我写下自己的名字和有关情况。《新政治家》杂志这个名字也许使他想起了什么，我们就围绕该杂志聊了一会儿。后来，我告诉他，我在苏联住过好长时间，在苏联完成了学业。这时，周恩来露出了明显的惊讶：“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怎么去的？为什么去？”他像连珠炮似的向我提出了一个个问题，我一五一十和盘托出。“苏联的战争打得很苦，对么？”他充满同情地问道。再后来，他竟没有问我最担心的问题：“你为什么要离开苏联？”而是把话题一转，同我谈起他熟悉而喜爱的波兰来，最后他说：“我敢肯定，你会对中国感兴趣的。”

我告诉他，我主要想把中国的经验和苏联的经验加以比较。周恩来说：“你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有他这句话，对我写书来说也就足够了。我又告诉他，在雪铁龙汽车厂管理处，发现了四十年前他的一张登记卡，当时就注明他是一名危险的煽动分子。

^①原文如此，1963年时，周总理应是65岁。——编者

周恩来极力否认，说他根本没有在雪铁龙做过工，也许那是一个同名同姓者，但他承认自己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是在巴黎完成的，自己的第一张马列主义报纸也是在巴黎创办的。这时我又想起，除斯诺之外，周恩来和我还有一位共同的朋友，这就是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于是我告诉他，有一天西哈努克对我讲过这么一句话：“我派往巴黎的留学生回到金边时都成了共产党人，派往莫斯科的留学生回时都成了反共分子。”这句话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周恩来神采飞扬，把它翻译给在座的其他中国人听。说完不久，我就后悔起来：我就是在莫斯科附近上的学，而不是在巴黎，也许我不该说这番话。可周恩来并没有做这种由此及彼的联想，而是热情地跟我道别。

三天以后，在中国代表团即将离开之际，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招待会，所有记者都应邀出席。周恩来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但因为我想问问他如何办理签证，就设法往前挤。我终于成功了。周恩来一眼认出了我，操着他那奇特的法语问我：“你好啊！波兰人！”我觉得这是个吉兆。关于办理签证事宜，他请我找外交部部长助理龚澎女士。一年以后，我就办好了签证。

后来在北京，我又一次见到了龚澎女士，请她替我联系采访周恩来。我问她，总理记得我跟他在阿尔及尔的会面吗？“当然记得！那次宴会上你让他大为惊讶，我们花了好长时间才弄清了你到底是什么人。”话说得直率坦白，表明他们仔细认真地研究过有关我的档案，对我从苏联出走，写过许多反斯大林的文章并不介意。中国人对别人的过去不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是我始料不及的。

三、四月五万里

我们访华，完全是自掏腰包，所以即便延长时间，也不算辜